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赵晓阳
编

吴耀宗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赵晓阳
编

吴耀宗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吴耀宗卷/赵晓阳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0-18562-0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吴耀宗 (1893~1979)-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0181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吴耀宗卷

赵晓阳 编

Wu Yaozo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3 插页 3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30 000	定 价	7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吴耀宗 (1893—1979)



吴耀宗一家



吴耀宗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 言

进入 21 世纪的我们，要探讨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或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探讨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或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对中国教会或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吴耀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人物。他以其富有远见和现实性的基督教思想，以其与中国政治和社会高度结合的理论 and 实践，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吴耀宗，英文名 Y. T. Wu，祖籍广东顺德。1893 年 11 月 4 日，他出生于广州的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中，父亲吴逢敬是一位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吴耀宗是第一代基督徒。早年在广州私塾及育才学校求学，1908 年北上京城，在北京税务专科学堂读书，对当时的人来讲，任职海关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上学期间，因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而接触到基督教，开始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途。1913 年，吴耀宗毕业于北京税务专科学堂，先后在广州、牛庄（今营口）等地的海关工作，1917 年任职北京总税务司。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查经班中，读到《圣经》中的《登山宝训》篇章，深深被耶稣的道理所吸引；1918 年 6 月，吴耀宗在北京基督教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

1920 年 11 月，不顾亲友的强烈反对，吴耀宗辞去待遇优厚的海关职务，来到比海关薪水低三倍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任校会部学生干事，负责基督教学生运动，从此开始了他服务基督教和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一生。1924 年至 1927 年，在基督教青年会资助下，吴耀宗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其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詹姆士的

宗教信仰的教义》(William James's *Doctrine of Religious Belief*)。威廉·詹姆斯(1842—1910)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1927年,吴耀宗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回国,赴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校会部主任干事。因工作之便和职责要求,他经常与各地青年学生接触,其思想也与各种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潮动向和时代走向紧密结合。1937年再次赴美演讲,1938年归国后,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干事,直至1950年。

除服务青年会、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外,吴耀宗还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基督教团体活动。1914年,英国基督教贵格会传教士霍德进(H. T. Hodgkin)等和平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因他曾在四川传教,其组织于192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唯爱社。吴耀宗深受唯爱主义影响,亲自起草中文成立宣言书,协助主编《唯爱》杂志,倡导和平运动,并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他还深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并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于1938年赴印度玛德拉斯参加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会议之机,当面敬赠甘地,并就非武力主义如何应用于国际问题进行请教。他曾多次表述,甘地是他最尊敬崇拜之人。

虽然吴耀宗一生都在青年会和基督教会里工作,尤其熟悉学校青年会工作,对青年学生格外重视,但他从来不以基督教会自限,生活思考在一个特殊阶层里。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参加了李公朴、阎宝航等组织的“东北社”,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宋庆龄等人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团体,利用青年会与青年学生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1936年底,吴耀宗先后在美国44所大学演讲123次,听众达25000人,呼吁美国及国际力量制裁日本侵华,为营救“七君子”组织国际支援。

1938年,吴耀宗还参加了许广平、胡愈之、郑振铎等民主人士在上海组织的“星二座谈会”,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出资组织了“复社”,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和《鲁迅全集》。1946年,他与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等11位社会贤达,作为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的代表成员,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呼吁和平,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还为代表团

草拟了一份英文备忘录，并当面交给马歇尔。他一直高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的认识和远见，使他获得了“午夜钟”的名号。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负责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领导开展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之后，他还历任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局主席等职，是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委、委员。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86岁。

二

吴耀宗一生都高度重视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他始终积极参与各个时期基督教刊物的创建、组稿和撰写工作，民国年间著名基督教刊物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都可以看到他积极的身影和努力的成果，这一切成为今天研究吴耀宗的文献基础。

1919年，他与在北京的中外基督徒徐宝谦、刘廷芳、步济时(John S. Burgess)、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组成了“北京证道团”(后易名“生命社”)，创刊出版了《生命月刊》，以“阐发基督教之真理实力，藉以促起学生个人及团体根本上之觉悟”为宗旨。吴耀宗任月刊的编辑委员，并积极撰文。他还与胡学诚、吴雷川、李荣芳、刘廷芳、彭锦章、宝广林、张钦士等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了“真理社”，以研究教会及国家问题为主，倡导基督教“文字本土化”，于1923年4月出版《真理周刊》(后改为半月刊)，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宣传基督教，他也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筹组工作，在《微音》、《华年》、《中国学运》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成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推动者。1945年，他还在成都创办了以关注基督教与现实为主旨的《天风周刊》，后移至上海。该杂志存续至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刊。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为数极少的自立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的当家人，吴耀宗还主持、策划、撰写、编译了多部系列书籍。20世纪30年代，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青年丛书”50种、“社会问题小丛书”20

种、“宗教问题小丛书”20种及“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书”10种等多达百本的系列丛书。今天看来，其中多本著述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本土化探讨的先驱之作。20世纪40年代，他还顺应20世纪基督教会合一主流，促成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超宗派联合——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战争特殊困难条件下，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生存困难和相互沟通问题，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在更大范围的超宗派联合工作的方式，提供了样板。

吴耀宗不仅从事出版编辑工作，自己终身也笔耕不辍，积极撰写和编译了大量文章和书籍，涉及中国基督教会、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督教与政治等广泛的主题。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实际问题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作品，这些包含着强烈社会关怀和神学视野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经典。

吴耀宗著述颇多，从语言角度可分为中英文两大类，据笔者的初步估计，其中文著述约150万字，英文约20万字。英文文章主要发表在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督教会《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和《中国基督教年鉴》(*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上，中文文章除在《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天风周刊》、《消息》、《青年进步》、《唯爱》、《华年》、《微音》、《中国学运》、《基督教丛刊》、《协进月刊》等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外，还在《民主周刊》、《世界知识》等社会性刊物上发表，表达他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和对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社会改造的各种思考和呼吁。他还将这些长短不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论著，结集成书出版，如《社会福音》(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出版)、《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出版)、《基督教讲话》(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出版)等。其中部分曾多次再版，成为一时之名品和精品。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曾在《基督教丛刊》上系列连载刊登，1943年合印单行本出版，1944年再版，1946年第3版，1946年10月第4版，1948年7月第5版，1948年10月第6版。该书是吴耀宗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作，亦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神学著作，旨在通过探讨上帝信仰的存在，进而在理论层面上调和上帝信仰与唯物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吴耀宗唯一一本系统性的专著。

此外，吴耀宗还出版了《中国青年出路问题》(青年协会书局1935

年出版)、《大时代的宗教信仰》(青年协会书局 1938 年出版)、《大时代中的上帝观》(青年协会书局 1940 年出版)等,翻译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科学的宗教观》(青年协会书局 1936 年初版,1948 年再版)。

三

吴耀宗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他青年时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一次最根本的大转变,确定了他一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相信基督教是因为《登山宝训》的内容打动了他,让他看到了一位平易近人的耶稣,丝毫不沾染任何的神秘色彩。他非常注重自己的重生得救经验,在多次的演讲和文章中都曾提到。从他众多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握了基督教信仰的两个基石:上帝的存在和祈祷的意义。

第二次转变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他“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但第二次的转变并不否定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有所深化,有所发展。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对基督教的信仰,直到 1979 年临终时,还是笃信基督教,热爱教会,还要求抱病去参加上海沐恩堂的复堂感恩礼拜。

吴耀宗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就从《圣经》中,特别是从耶稣的教训、行动中,从他的受害牺牲,看到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最高的原则。吴耀宗在以后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六十年的经历中,一直为这个理想和原则而奋斗,奉献他的一生。他始终既忠于他的宗教信仰,忠于他所认定的真理,又不违爱国的天职,不违他对上帝、对教会、对社会、对祖国所抱的托付。在几十年社会变革的大风大浪中,他不断前进,修正他对斗争方法的理解,到临终时他仍然没有放弃爱的理想和信念。

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过程,首先是早年对唯爱主义的热衷。唯爱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种和平主义思潮,主张以爱为对人、对事的最高原则,反对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刚刚信仰基督教的吴耀宗,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接受基督教之后,就认为要做一个真正、彻底的基督徒,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照着基督的“登山宝训”去做。他在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之

时，以极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才智，写了大量的社论、通讯、讨论和答辩，刊登在《唯爱》上（1931第1期至1935年，共17期），从中可看出他坚定信仰的彻底性。

随着抗日救国的时局变化，面对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是奋起和爱国同胞抗战杀敌，还是坚持唯爱主义，用和平的不合作方法救国，成为吴耀宗心中引起长期思想激烈斗争的矛盾。在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中，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淳朴的唯爱主义到对日不合作，到理论上唯爱、行动上支持武力抗战，到与各界爱国人士并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因爱而用武力并不违背唯爱精神，到歌颂武力抵抗侵略，最终完成了艰难的政治思想（也是神学思想）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他的第二次转变。

1937年，他再次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游学回来后，于次年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这时美国基督教会的“基要派”和“自由派”神学激烈斗争即将结束。“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实际上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是否运用理性和现代科学的语言、观点介绍和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教义的冲突。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主义神学”和“社会福音神学”的大本营，吴耀宗留学纽约协和神学院，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深受其影响。他更多地接受了协和神学院主导的结合社会、应对现实的自由主义神学，更多地趋向于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神学。

社会福音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北美地区的基督教神学思潮，其宗旨是根据《圣经》中耶稣关于天国的教训，纠正当时流传于北美教会的“奋兴福音派”只注重个人灵魂得救、忽视福音的社会意义的偏向。社会福音的信息既继承旧约先知的传统，又根据耶稣自己的教训，在神学上完全是正确的，在释经学上也是无懈可击的，它在20世纪初是一股纠偏的神学思潮，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起源于拉丁美洲，影响遍及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从某些方面看，正是这个“循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生发展和开花结果。

吴耀宗不是一位满足于玄思臆想的书生式神学家，而是投身于现实斗争，把信仰、思想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大勇大智的先知式神学家。《圣经》中和历史上的先知都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他是一位十分正直、信实、坦诚的人，一生强调并实践所信所想所行的一致性。从他的言论和文章，可以见到他的为人和内心深处，“他心里毫无诡诈”，以其行证其言。他毫不隐蔽他的信仰、思想、观点，勇于坚持自己所认为正